



打开红色记忆
发扬光荣传统

失败是成功之母，完整史料权威纪实

中国革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搏击

从苦难到辉煌，

沿着历史的轨迹告诉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李涛 著

赤都风云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
原国防部长

迟浩田 为本丛书题词



长征出版社
CHANGZHENG PUBLISHING HOUSE

赤都风云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

李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都风云 / 李涛著. — 北京 : 长征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80204-726-6

I. ①赤… II. ①李… III. ①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1933~1934) - 史料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2860号

书 名: 赤都风云

丛书策划: 樊易宇 陈锡祥

作 者: 李 涛

责任编辑: 陈锡祥

编 务: 芦 笛

监 制: 张永超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ISBN 978-7-80204-726-6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打开红色记忆
发扬光荣传统

遲浩田



前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90年的辉煌历程。90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英勇奋斗，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华彩篇章。同时经过长期革命烈火的千锤百炼，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开始只有50余名党员的党，发展到如今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曲折和艰难的。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就曾有过三次大的“左”倾错误，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一次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其后果是使城市工人暴动、农民武装起义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而失败；第二次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发动“中心城市起义”，强令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致使国统区的党组织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农村根据地不断缩小，甚至丢失；第三次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危害也最大，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的丢失。

中央苏区，是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的。当时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余万，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江西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而被称为“赤都”。由于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等坚持实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战略指导，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苏区大部丧失，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由此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值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我们更加怀念当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历尽艰难险阻，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勇于献身的红军将士们。编撰此

书，既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具有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重大意义。

本书通过运用权威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以纪实的手法和翔实生动的语言，记述了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全过程，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揭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诸多谜团。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一批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得到了军事图书资料馆等单位及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军事科学院军史所褚银研究员审读了全书，长征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陈锡祥为此书最终付梓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以及查阅资料等因素的限制，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2年10月于京西

楔子

自诩能将马列经典著作倒背如流的王明雄心勃勃地从莫斯科回到了十里洋行的大上海，借助恩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鼎力支持，一步登天，执掌了中共大权，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王明不想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便趁机远赴苏联，将中共最高权力的接力棒传给了他的同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博古。王明住在莫斯科的洋楼里，通过红色电台，遥控指挥博古。自此，“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开始泛滥；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军权……

● 借助共产国际的影响，名不见经传的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领导人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反动势力猖獗，帮派林立，帝国主义租界杂处其间，三教九流人物混迹于此，社情、民情极端复杂。

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市兴业路76号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此后,中共中央机关就在上海安家,看中的就是这里复杂的环境,便于立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肆搜捕、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自然成为蒋介石关注的重点。一时间,腥风血雨笼罩着大上海,白色恐怖下到处风声鹤唳。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不屈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8月1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9月,毛泽东等人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军,胜利到达井冈山地区的宁冈县,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自此,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走上了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星星之火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

1929年初春,一个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一路辗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苏联回到了上海。这位带着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厚望、肚子里装满马列主义教条的青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赋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雄心斗志:

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西问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云搏暗光。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志正昂扬。

此人就是陈绍禹,也就是后来曾在中国共产党内风云一时的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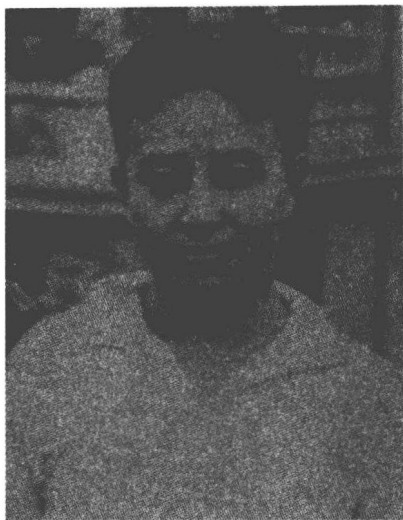
王明,1904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原名陈绍禹。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沈泽民等人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结识了副校长米夫。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实际上成了一所中共“高级党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力图通过这所“高级党校”,培养出一批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对米夫言听计从,讨好卖乖,因此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信任,成为其得意门生。由米夫在后台撑腰,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

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诩的王明,因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支持,俨然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即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宗派的最

大特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圣经”，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当做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固定模式，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灵丹妙药。

王明回国后，先是在上海沪东区委做宣传工作，后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和采访员。

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王明接掌中共大权。但王明很不争气，不仅没有得到当时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重用，反而因违反党的纪律受到了批评和纪律处分。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教条宗派的米夫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亲自来华，扶植王明上台。



王明（陈绍禹）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会议始终在一片吵闹声中进行。

为确保王明上台，米夫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拿出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向代表们施压。选举的结果是，原来只是一名普通党员的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

王明的上台，是米夫在中共党内导演的一幕丑剧。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对王明路线以及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评价：

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选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此人胸无主见，对王明言听计从。王明实际上掌握了党的领导大权，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重大挫折自此开始。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上台伊始，王明就不遗余力地开始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为此，他采用“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办法，先后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派夏曦、张国焘分别出任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在全国各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手握尚方宝剑，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钦差大臣”，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一大批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或对“左”倾冒险主义执行不力的革命干部蒙冤受屈。

在白区，王明积极推进“进攻路线”，经常无条件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这种近似疯狂的做法，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倒为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白区党的组织不断被敌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毒手。

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情报保卫工作）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幸亏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做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得知情报后，及时通知党组织，才避免了上海中央机关被一网打尽的惨剧。

祸不单行。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两天后，这个可耻的叛徒没有落得好下场，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空缺，此时党中央的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由王明主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严重的白色恐怖使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蒋介石曾悬赏500块大洋捉拿王明。为逃避追捕，王明到处躲藏，甚至曾跑到尼姑庵里住了一段时间。

王明的弟弟陈绍杓回忆道：

1931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我上街买东西，遇到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块大洋抓他。他坐着黄包车，戴着帽子，去郊区避风。他和我在小餐馆吃饭，我看见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

王明意识到自己也有可能步向忠发的后尘，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每日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生活又使他无比厌倦，深感上海终非久留之地，不如找个机会远走高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过逍遥自在的日子。

恰好这时，共产国际也需要中共派一位负责人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认为这正是自己远离是非之地的机会，于是决定再赴苏联。

为确保自己离开后仍能控制党中央，王明做了精心安排。由他提名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在这个班子中，大多数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同时又都听从他的指挥。

一切安排妥当后，10月18日，王明起程离开上海远赴苏联。临行前，他“再三关照博古，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从此，中共历史上一个长达4年极为特殊的时期开始了——远离国内严酷的斗争、身居莫斯科的高楼大厦、吃着洋面包、过着悠闲的社会主义生活的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发号施令，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内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上演了一幕幕“左”倾祸国的悲剧，险些葬送了中国的革命……

● “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泛滥，毛泽东再次被剥夺兵权

随着王明的上台，毛泽东一生中最为重大的打击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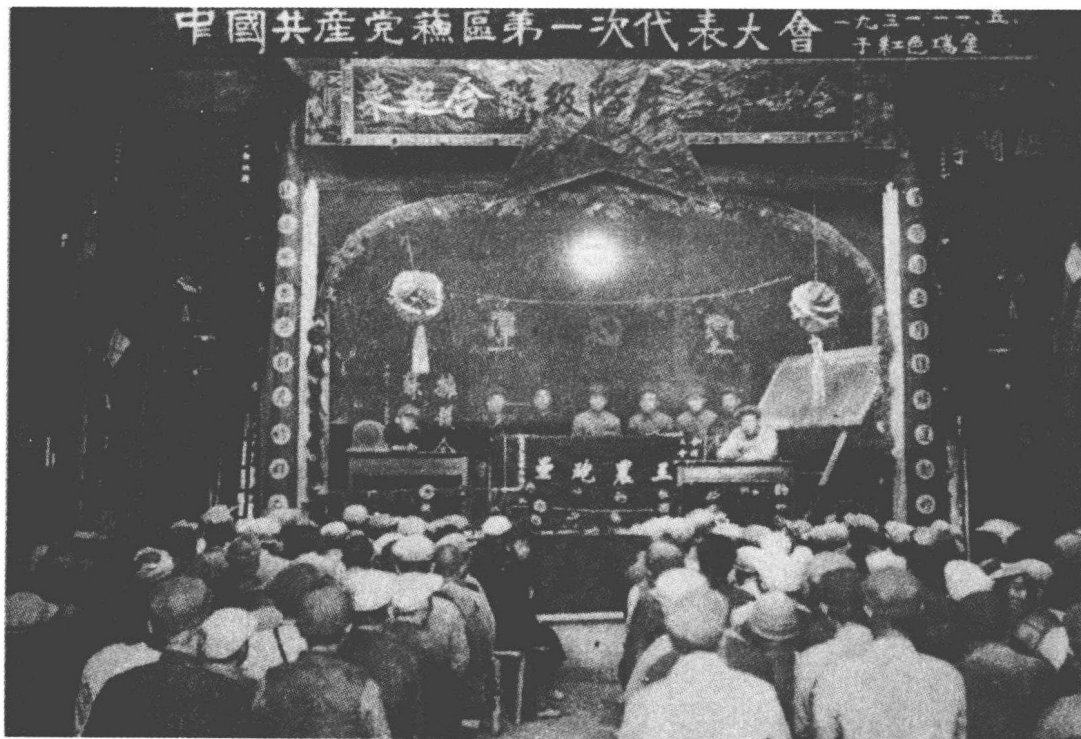
1931年3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斯基向国际各支部宣告：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右倾始终都是主要危险。这给王明“左”倾路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于是，在这年8月，中央苏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定》，认为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情绪。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指示。

根据这个指示，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史称赣南会议。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主席台中坐者为毛泽东，右四为朱德）



会议集中火力批判了毛泽东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鉴于毛泽东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由项英接任。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红军由中革军委统辖指挥，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随之被取消。

这是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唱主角，也是开始夺取毛泽东领导权的第一步。

失去兵权，对毛泽东来说已不是第一次。

上一次是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由于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认识不一致，毛泽东被解除了前委书记的职务，被迫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去指导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政权。

不过那次时间很短。同年11月中旬，陈毅亲自来到上杭苏家坡接毛泽东回红四军。原来，陈毅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会后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党中央、周恩来向红四军前委发了指示信和口头指示，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军思想，认为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是错误的，并指示立即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要他们请毛泽东火速回红四军担任领导。这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就这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前委

“中央九月来信”的诞生（油画）



工作。

1931年12月，周恩来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下，当时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红军，冒险攻打敌人重兵把守或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周恩来考虑到当时敌我双方的态势，回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合理建议，只是复电周恩来：让他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根据这一指示，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连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

中革军委随即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规定中央红军坚决夺取赣州，以此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胜利，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2月4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围攻赣州。由于仓促应战，兵力不集中，装备落后，加之赣州易守难攻，结果围歼战打成了消耗战。纵使彭德怀指挥若定，红军将士英勇无敌，激战月余仍没有斩获，被迫于3月7日撤围赣州，在赣县江口地区集结。

1932年4月，红军攻克漳州缴获的国民党飞机



周恩来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行动方针，决定红军主力应向北发展，并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后改为东路军），以红三军团和湘赣、湘鄂赣苏区的地方武装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3月30日，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

此计果然奏效。

4月20日，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守敌49师大部，俘敌1674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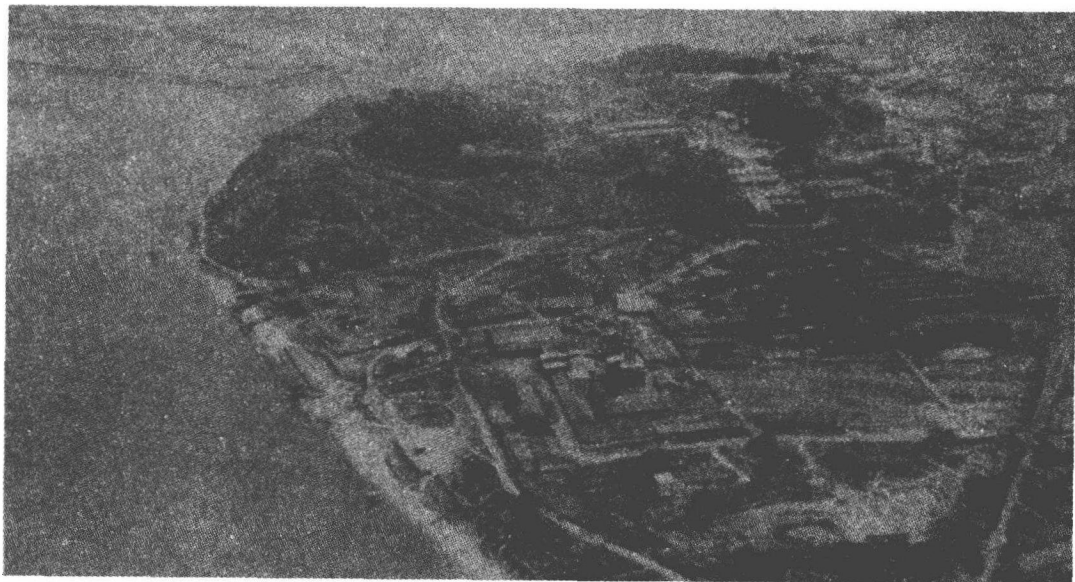
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漳州大捷，达到了剪除粤敌一翼的目的，对整个时局影响很大。”

但，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冒犯了“左”倾领导者既定的战略部署。于是，一场针对毛泽东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开始了。

早在4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内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篇文章，把党内的正确思想以及对“左”倾冒险主义持怀疑抵制态度的同志，一概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全党要加以最坚决无情的斗争。

十天后，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各苏区党面前主要的危险。

吉安城



5月11日，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的这封信后，经过激烈讨论，最后还是决定接受中央的批评。

周恩来起草决议，承认苏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以来，对目前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临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进行指责：

伍豪（周恩来——引者注）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險，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没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来发展一省或数省的胜利……

周恩来一时左右为难，明知临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但又不能不去执行。在临时中央斥责和督促下，5月30日，周恩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5月下旬，蒋介石调集第十九路军进驻福州，粤军3个师开赴赣南。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计划，首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名称。

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粤军15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以稳定。

21日，临时中央发出了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的指示信，继续批评苏区红军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策略，没有积极地扩大苏区。与此同时，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对此，周恩来却有不同意见。

25日，他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权决定。

29日，周恩来在给苏区中央局的信中，坚持由毛泽东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观点，指出：

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由毛泽东指挥，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考虑……

经周恩来据理力争，毛泽东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负责处理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反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

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人。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致电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然而，中央苏区并没有对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完全理解，于26日回电，仍主张攻取一省或数省的既定目标。

前线面对这样的指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实在难以从命，只好按兵不动，用沉默对抗中央局的命令。

就这样，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而不顾前方的实际困难，一味地督促前方进攻。

29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